

新文化运动时期 (1915—1924年) 的价值观重建

XINWENHUA YUNDONG SHIQI
1915-1924NIAN DE JIAZHIGUAN CHONGJIAN

薛子燕 著



人民出版社

新文化运动时期 (1915—1924年) 的价值观重建

薛子燕 著



人民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曹 歌

封面设计：姚 菲

版式设计：鲍春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文化运动时期(1915—1924年)的价值观重建/薛子燕 著.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7.10

ISBN 978-7-01-018603-0

I. ①新… II. ①薛… III. ①价值论-思想史-研究-中国-1915-
1924 IV. ①B2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90539 号

新文化运动时期(1915—1924年)的价值观重建

XINWENHUA YUNDONG SHIQI 1915—1924 NIAN DE JIAZHIGUAN CHONGJIAN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4.25

字数:333 千字

ISBN 978-7-01-018603-0 定价:40.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本书受到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学科建设经费、华侨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青年学者成长工程”团队项目（16SK-GC-QT01）的共同资助

序

李维武

薛子燕博士的第一部学术专著《新文化运动时期(1915—1924年)的价值观重建》即将由人民出版社付梓出版。作为子燕的博士生导师,我感到十分高兴、特别欣慰,在这里对这位哲学新人和这部哲学新著表示祝贺!同时,我想谈谈自己对有关新文化运动几个问题的思考,并对子燕其人其书作一介绍,为读者诸君进入这部书提供一个导读。

一、“新文化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时期”

子燕的这部专著,首先从书名上看,涉及“新文化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时期”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看起来区别不大,但实际上并不是重合的,而是既相关联、又有区别的。

新文化运动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是鸦片战争后最为深刻的思想文化革新运动。1920年1月,孙中山在《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中说:“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①,就是对这一运动的评价。自此以后,“新文化运动”

^① 孙中山:《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载《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10页。

成为一个概念为人们广泛使用。新文化运动发生于1915年,结束于1924年,前后持续十年之久。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一年后更名为《新青年》),成为中国学术界公认的新文化运动开端,2015年对新文化运动的百年纪念即是证明。1924年,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召开中国国民党一大,国共两党由此正式达成第一次合作,并于1925年共同发动以国民革命为旗帜的大革命,从那以后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取代思想文化运动成为近代中国历史的主旋律,因此这一年可以视为新文化运动的结束。当然这个终结的时间具有一定的相对性,在大革命时期仍有新文化运动的余波,不是大革命开始后新文化运动即就此打住了;但从总体上看,以1915—1924年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开展期是恰当的,准确地反映了近代中国历史的实际进程与发展阶段。

新文化运动时期则是近代中国历史中的一个时段,这个时段以新文化运动的开展作为标记,在起止时间上与新文化运动是一致的。在这一时段中,不仅有新文化运动成为最具有标志性的重大事件,而且还存在着许多与新文化运动相联系、但并不属于新文化运动的内容。在这一时段中出现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如1919年五四运动的发生、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1924年中国国民党一大的举行,尽管与新文化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并不能算作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在这一历史时段中活动的一些重要思想人物,如因倡导孔教而为新文化运动所批判的康有为、因不满西化而成为新文化运动批评者的梁漱溟、因思想保守而成为新文化运动反对者的林纾,尽管都同新文化运动相关涉,但也不属于新文化运动人物。还有的人物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更为复杂,这一时段

中的孙中山就是如此：在五四运动之前，孙中山只是新文化运动的旁观者，他在这一时期所完成的重要思想著作《建国方略》并不属于新文化运动的成果；在五四运动之后，孙中山率追随者加入新文化运动，他指导国民党人创办的《建设》杂志和《星期评论》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报刊。由此可见，“新文化运动时期”与“新文化运动”不是内涵相同、外延一样的概念。前者与后者相比，虽然处于相同的历史时段中，但却有着更为广阔的历史空间，涵括了更为多样、更为丰富、更为复杂的内容，是一个体现了历史运动总体性的概念。

以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举行爱国示威游行为标志的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时期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从起因和性质上看，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是两个不同的运动，但这两个运动之间又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五四运动的思想发动和骨干成员都来自新文化运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的发生做了准备；而五四运动又对新文化运动乃至对整个近代中国历史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使新文化运动由此划分为前后两个大的阶段，使近代中国历史由此划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大的时期。正是这样，人们又往往以“五四运动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这些概念来称谓新文化运动时期。这些概念所标示的时段，与“新文化运动时期”概念实际上是相同的，并不是仅指1919年五四运动的起止时段。

子燕的这部专著，以《新文化运动时期（1915—1924年）的价值观重建》为书名，以“新文化运动时期”作为全书的第一个关键词，所强调的是新文化运动时期这一历史时段，其用意也就在于凸显这种历史运动的总体性。她在这部专著中，不仅着重探讨了新

文化运动确立新价值观的基本历程,而且也探讨了与新文化运动相互动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想家对传统价值观的现代转化,由此从总体上来展示新文化运动时期价值观重建的多样性、丰富性和复杂性,全面总结中国价值观的古今之变。这是在进入这部专著时,首先需要注意的。

二、新文化运动时期价值观重建的内涵

新文化运动之所以成为鸦片战争后最为深刻的思想文化运动,其缘由当然不止一端;而其中重要一点,就在于这一运动成为了中国价值观古今之变的关节点。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价值观大变动,经过新文化运动发生了质的飞跃;自19世纪中叶开始逐渐解体的传统价值观由之而解构,自19世纪中叶开始不断萌生的新价值观则由之而确立。早在1919年,当新文化运动还在蓬勃开展之际,胡适就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借用尼采的名言“重新估定一切价值”^①,从价值观变动上来表达新文化运动作为新思潮的意义。从那时以来,肯定新文化运动与中国价值观古今之变的联系,成为中国学术界的共识。即使是新文化运动的批评者和反对者,也没有否定这一点。林纾在这一年发表的致蔡元培信中,指责新文化运动“必覆孔孟、铲伦常为快”^②,就是从反面表达了中国价值观所遭遇的空前变局。

然而,对于新文化运动时期价值观重建的内涵,中国学术界却

①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载《胡适文集》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52页。

② 林琴南:《致蔡鹤卿书》,载《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1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91页。

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和明显的分歧。这种分歧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胡适与陈独秀这两位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那里。对于新文化运动所要确立的新价值观,他们在当时就有不一致的理解。

陈独秀认为,新文化运动所主张的新价值观,集中体现在他发起这场运动之初就明确倡导的“科学”观念与“民主”观念上。在《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上,他在《敬告青年》一文中凸显了“科学”观念;在《青年杂志》第1卷第2号上,他又在《今日之教育方针》一文中凸显了“民主”观念;由此“科学”与“民主”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两面大旗,并被比喻为引领中国人由黑暗走向光明的“赛先生”和“德先生”。针对新文化运动的批评者和反对派对《新青年》的种种攻击,陈独秀旗帜鲜明地为“民主”观念与“科学”观念进行辩护,尖锐地指出:“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①通过“赛先生”与“德先生”的生动形象,“科学”与“民主”的新价值观深入人心,陈独秀也因此被新青年们视为“思想界的明星”^②。

对于陈独秀的主张,胡适表现出并不完全赞同的态度,认为:“这话虽然很简明,但是还嫌太拢统了一点。……这个问题可就

① 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载《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42—443页。

② 毛泽东:《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载《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305页。

不是几句笼统简单的话所能回答的了。”^①在他看来,新文化运动所主张的新价值观表现在不同的方方面面,从小的生活习俗到大的政治态度都有具体的表现,并不就一定集中体现在“科学”观念与“民主”观念上。他说:“从前的人说妇女的脚越小越美。现在我们不但不认小脚为‘美’,简直说这是‘惨无人道’了。十年前,人家和店家都用鸦片烟敬客。现在鸦片烟变成犯禁品了。二十年前,康有为是洪水猛兽一般的维新党。现在康有为变成老古董了。康有为并不曾变换,估价的人变了,故他的价值也跟着变了。这叫做‘重新估定一切价值’。”^②在他看来,从缠小脚到不缠小脚,从抽鸦片烟到禁抽鸦片烟,这些都与“科学”观念与“民主”观念并无直接关系,但确又属于“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范畴,属于新文化运动倡导的新价值观。

陈独秀与胡适之间的分歧,看起来只是一个在新价值观的倡导上各有侧重的认识问题:陈独秀凸显的是新价值观中意义最为重大者,胡适看到的则是新价值观的一些具体细目。但这些看似不大的分歧,实反映了他们对革新中国的不同态度:陈独秀主张先立乎其大者,力图从根本处入手革新中国;胡适则力主从细微处着眼,以一点一滴的渐进方式进行改良。这种区别在五四运动之后演变成了更大的思想分歧,形成了“主义”与“问题”之间的对立,造成了新文化运动阵营内部的马克思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分化,也导致了“社会主义”作为新价值观在新文化运动后期的凸显和流行。

①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载《胡适文集》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51—552页。

②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载《胡适文集》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52页。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价值观,其实在新文化运动发起之初就已经为陈独秀所论及。在《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上,陈独秀还发表了《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一文,把“社会主义”与体现“民主”观念的“人权说”、代表“科学”观念的“生物进化论”作为近代文明的三大特征。他指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和运动实是近代欧洲社会矛盾的产物:“近世文明之发生也,欧罗巴旧社会之制度,破坏无余,所存者私有财产制耳。此制虽传之自古,自竞争人权之说兴,机械资本之用广,其害遂演而日深:政治之不平等,一变而为社会之不平等;君主贵族之压制,一变而为资本家之压制。此近世文明之缺点,无容讳言者也。欲去此不平等与压制,继政治革命而谋社会革命者,社会主义是也。”^①他又指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是由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贝夫所开创,由19世纪初的圣西门和傅立叶所发展,“其后数十年,德意志之拉萨尔(Lassalle)及马克思(Karl Marx),承法人之师说,发挥而光大之,资本与劳力之争愈烈,社会革命之声愈高”^②。但那时的陈独秀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问题还缺乏深刻的认识,因而没有把“社会主义”与“科学”、“民主”一样作为新价值观来倡导和高扬,他的这些论述也不为时人所注意。只有经过了五四运动,随着李大钊、陈独秀相继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共同发起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社会主义”才作为新价值观在中国思想世界获得了广泛传播、产生了巨大影响。1920—1921年,主要在陈独秀、李达与梁启超、张东

① 陈独秀:《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载《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7—138页。

② 陈独秀:《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载《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8页。

孙之间开展的社会主义问题论战,不仅使“社会主义”作为新价值观在新文化运动中鲜明地凸显出来,而且使中国人开始明确区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并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在当时诸多社会主义主张中得以胜出而成为主流。1921年初,蓝公武发表《社会主义与中国》一文,指出了中国思想世界的这一重大变化:“中国真正有人研究社会主义,却在最近的两年中。这自然是大战的反动,俄国大革命的影响,所以能使世界潮流也侵入这思想上交通断绝的中国来。”^①

在倡导“社会主义”新价值观的同时,陈独秀又对原来提倡的“科学”观念与“民主”观念进行了新的阐释。他对“科学”观念的外延加以扩大,认为不仅包括实证自然科学,而且还包括实证社会科学,唯物史观作为实证社会科学的一种,由此而成为“科学”的重要内容。他对“民主”观念的内容予以更新,由对以欧美国家为样板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倡导,转变为对以俄国十月革命为榜样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追求。这种对“科学”观念与“民主”观念的新阐释,随着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毛泽东指出:“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②正是这样,他把陈独秀称为“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认为“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③。

① 蓝公武:《社会主义与中国》,载《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1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37—538页。

② 毛泽东:《反对党八股》,载《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2页。

③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载《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4页。

在新文化运动发起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再来看新文化运动时期价值观重建,由于拉开了一个较长时段距离,因此有可能比当时身处其间的人们获得一个更为清楚的认识。这就是新文化运动时期得以确立并深入人心的新价值观,并不是胡适所感兴趣的“不缠小脚、禁抽鸦片烟”,而是由陈独秀所揭示和倡导的“民主”、“科学”和“社会主义”。从那时以来的中国历史进程表明,正是这些新价值观激发和引导了中国人在百年间的追求与奋斗,造成了中国社会历史的空前大变动,重新塑造了现代中国。可以说,正是这些新价值观,集中体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价值观重建的基本内涵。如果把新文化运动说成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新思潮,那么这场运动所确立起来的新价值观应当主要是这些内容。当然,不缠小脚、禁抽鸦片烟在当时也属于新价值观的范畴,严禁毒品在今天仍然是中国社会治理的一项重要工作,但仅仅这些内容绝不可能激发和引导中国人的百年追求与奋斗,对重新塑造现代中国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

对于新文化运动时期价值观重建,不仅新文化运动发挥了主导作用,而且新文化运动之外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想家也作出了努力。他们在中国价值观新旧更替之际,力图对传统价值观作出更多的保留,使价值观重建带有更多的传统印记。在他们看来,只有这样才是中国价值观重建的正道。梁漱溟即言:“现在只有踏实的奠定一种人生,才可以真吸收融取了科学与德谟克拉西两精神下的种种学术种种思潮而有个结果;否则我敢说新文化是没有结果的。”他并不反对以“科学”与“民主”作为中国的新价值观,但不赞同由此而抛弃中国的传统价值观,而强调新价值观必须以传统的人生价值、人生态度为基石,“以孔颜的人生为现在的青年解决

他烦闷的人生问题,一个个替他开出一条路来去走”^①。这些文化保守主义思想家的努力,在当时似乎与新文化运动逆向而行,并未成为价值观重建的主流,但却对价值观重建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思想,因而也是新文化运动时期价值观重建的不可忽视的内容。

三、新文化运动时期价值观重建的原因

中国价值观为什么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发生如此深刻的变动呢?这个问题所探讨的,不仅是新文化运动时期价值观重建的原因问题,而且是新文化运动时期价值观重建的合理性问题。也就是说,只有真正从社会历史动因中引出的原因,才具有历史必然性,也才能说明新文化运动时期价值观重建的历史合理性。然而,正是在这个问题上,自新文化运动兴起后就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使这个问题至今仍然没有定论。

在文化保守主义者看来,新文化运动时期价值观重建是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人物吸取西学、主张西化、全盘反传统所致。当时曾与陈独秀有过激烈论争的杜亚泉就持这样的看法,他说:“现时吾国民思想之冲突,概由与西洋思想相接触而起。以亘古不相交通之东西洋两种思想,忽相接触,异点之多,自不待言;况两种思想,各有悠久之历史、庞大之社会以为根据,其势自不能相下。”^②他由此对中国人引入和吸取西方思想文化极为怨恨,认为:“吾人往时羡慕西洋人之富强,乃谓彼之主义主张,取其一即足以救

^①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载《梁漱溟全集》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39页。

^② 杜亚泉:《再论新旧思想之冲突》,载《杜亚泉文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11页。

济吾人，于是拾其一二断片，以击破己国固有之文明。此等主义主张之输入，直与猩红热、梅毒等之输入无异。”^①这就把新文化运动时期价值观重建的原因归结为新文化运动人物的主观动机，而这种主观动机实为情绪化的产物，当然不具有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合理性。

而在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人物看来，新文化运动时期价值观重建是由辛亥革命后所面临的现实政治危机所引发的。陈独秀认为，正是由于袁世凯以孔子、孔教和儒家纲常为思想旗帜，公然颠覆共和制度以恢复帝制，从而引发了新文化运动的猛烈批判，激起了“新旧思潮之大激战”^②，促成了中国价值观的新旧更替。1916年初，他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中即有明确论述，指出：“儒者三纲之说，为吾伦理政治之大原，共贯同条，莫可偏废。三纲之根本义，阶级制度是也。所谓名教，所谓礼教，皆以拥护此别尊卑、明贵贱制度者也。……吾人果欲于政治上采用共和立宪制，复欲于伦理上保守纲常阶级制，以收新旧调和之效，自家冲撞，此绝对不可能之事。盖共和立宪制，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③他所说的伦理问题，也就是价值观问题。这就把新文化运动时期价值观重建的原因归结为现实政治危机，以反帝制、反复

① 杜亚泉：《迷乱之现代人心》，载《杜亚泉文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11—312页。

②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载《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7页。

③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载《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9页。

辟、保卫革命成果、顺应历史潮流的正当性,论证中国价值观古今之变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合理性。

当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从新文化运动阵营中产生出来后,他们开始用唯物史观考察近代中国的思想变动,力求从经济变动中发现思想变动的根据,阐明新文化运动时期价值观重建的原因。首先开展这一工作的是李大钊。1920年初,李大钊发表了《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运用他刚刚掌握的唯物史观考察和说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对新文化运动时期价值观重建的原因予以新的阐发。在文章的开篇,他强调了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凡一时代,经济上若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发生变动。换句话说,就是经济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重要原因。”^①根据唯物史观的这一观点,他指出中国传统价值观是以孔子主义为其代表,而孔子主义在二千余年来支配中国思想世界的真正原因,正在于它是以前近代的农业社会及与之相适应的大家族制度为基础。在古代中国,由生产力发展状况所决定,这种大家族制度也同时是前近代的农业社会的经济组织,两者密切地结合在一起。正是在这个基础构造之上,生发出了二千余年来的中国人的政治制度和精神世界,“一切政治、法度、伦理、道德、学术、思想、风俗、习惯,都建筑在大家族制度上作他的表层构造”^②;在这些表层构造中,孔子所开启的儒家思想最具有代表性和总括性,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价值观,“中国的一切风俗、礼教、政法、伦理,都以大家族

① 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载《李大钊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0页。

② 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载《李大钊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1页。

制度为基础,而以孔子主义为其全结晶体”^①。他进而指出,自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以来,随着西方文明的影响日益扩大,随着西方工业经济对东方农业经济压迫的加深,中国农业社会及其大家族制度开始崩解,这就使孔子主义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根本动摇,其思想与伦理也就开始走向衰落,逐渐失去了支配中国思想世界的作用。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20世纪初的中国开始出现了种种新的思想潮流、新的社会运动,作为孔子主义的对立物和批判者而发展起来。“试看中国今日种种思潮运动,解放运动,哪一样不是打破大家族制度的运动?哪一样不是打破孔子主义的运动?”^②基于以上论析,他得出结论说:“我们可以正告那些钳制新思想的人,你们若是能够把现代的世界经济关系完全打破,再复古代闭关自守的生活,把欧洲的物质文明、动的文明,完全扫除,再复古代静止的生活,新思想自然不会发生。你们若是无奈何这新经济势力,那么只有听新思想自由流行,因为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不是几个青年凭空造出来的。”^③这就从经济基础中揭示了新文化运动时期价值观重建的更深层原因,更深刻更本质地阐明了中国价值观古今之变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合理性。

李大钊的这些见解,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承继和发挥。20年后,毛泽东在1940年初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一文,进一步运

① 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载《李大钊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4页。

② 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载《李大钊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4页。

③ 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载《李大钊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7页。